

源域—目标域映射视角下农耕与游牧文化语境中 “狗” 谚语的比较研究*

황후님** · 吴政轩***

目 录

1. 引言
2. 理论框架与分类原则
3. 跨域映射比较分析
 - 1) 讽刺·揭露类
 - 2) 人情·事理类
 - 3) 警惕·告诫类
 - 4) 品行·修养类
 - 5) 用途·需要类
 - 6) 胸怀·信心类
 - 7) 爱憎·好恶类
4. 结论

中文摘要

本文在认知语言学“源域—目标域”映射框架下，以汉语与蒙古族语“狗”类谚语为对象，对语料进行语义功能分类与跨文化比较。研究将相关语料划分为七类，考察“狗”在不同语境中的认知功能及其目标域投射路径。

* 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of Korea(NRF-2021S1A5C2A02086852)

** 한국외국어대학교 중국연구소 몽중일 프로젝트 연구원

*** 韩国外国语大学韩中文化系硕博连读生

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分别对应社会批判、经验归纳、风险识别、规范建构、功能评估、人格认知与情感表达等认知功能,表明动物隐喻并非源域特征的机械复制,而是在不同社会经验中的选择性激活与功能性重组过程。在跨语言比较中,汉语语料相对侧重关系结构、伦理秩序与行为规范,蒙古族语料则相对侧重功能实现、情境适配与行动过程,呈现出不同社会生态背景下隐喻激活路径的差异。

本文据此提出动物隐喻的社会认知功能模型,为理解语言、认知与社会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分析视角。

关键词: 动物隐喻; 源域-目标域映射; 认知功能; 谚语; 汉蒙比较; 社会认知模型

1. 引言

谚语是民众长期口头实践的产物,是集体经验与社会智慧的高度凝结。其形成经历代际传承、反复锤炼与社会筛选,因而具有结构稳定、表达凝练和认知模式固化等特征。正如学者所言,谚语是“语言中的盐”,蒙古族亦有言:“最干净的水是泉水,最精炼的话是谚语。”¹⁾谚语不仅浓缩生活经验,更承载民族社会的认知结构与价值体系,是观察民族文化心理与思维模式的重要窗口。

在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导的汉语传统文化语境中,谚语往往围绕伦理秩序、社会等级与行为规范展开,强调礼法意识、群体协调与道德评判。动物意象在汉语谚语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多被纳入人伦秩序与社会评价体系,通过褒贬分明的象征结构强化价值判断。“狗”在汉语语境中常承载卑微、依附、狡诈或贬抑意味。²⁾

1) 参考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辑,《蒙古族谚语》(1982:编者序)。

2) 张艳慈(2013:15)将中国民间叙事中“狗”的文化意象概括为两种相反的意义体系:一为忠诚与服从的正面形象,如“犬马之劳”“犬马恋主”等表达,体现狗对主人的依附与忠诚;二为阿谀与卑贱的负面形象,如若干谚语中所呈现的趋附权势与卑劣行为,反映出文化中对狗的贬抑性认知。该双重结构表明,“狗”在汉语文化语境中同时具有忠诚与贬抑两种象征取向,其中负面意义在民间表达中较为常见。

相较而言,在蒙古族传统文化中,谚语不仅是日常经验的语言结晶,更是草原社会组织结构与价值体系的表达方式。游牧生产方式所形成的人畜共生结构,使动物成为社会经验建构的重要认知资源。“狗”因与牧业生产、家庭安全密切相关,在蒙古族社会中具有功能性与伦理性的双重地位。其源域特征更易被激活为“守护”、“协作”、“忠诚”、“警觉”等功能框架,从而进入家庭伦理与生存协作的价值体系之中。在整体语义结构上,相较于汉语系统,其功能性与守护性特征表现得更为突出。³⁾

这种象征差异并非简单的褒贬对立,而是在不同社会生态结构与生产方式背景下形成的差异化认知投射。在农耕社会语境中,动物意象相对更容易被纳入道德评价与社会等级的象征体系;相较而言,游牧社会语境中的动物表达则更多呈现功能协作、环境适配与风险应对等特征。同一动物源域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被赋予差异化的目标域指向,反映出不同社会经验背景下认知建构路径的结构差异。

既有关于“狗”谚语的比较研究亦揭示了其文化取向差异。包苏日娜与李慧贤(2023)指出,蒙古文化语境中“狗”更多承载忠诚与守护的正面功能,而汉语系统中则较多呈现讽刺性与贬义色彩;韩琦(2023)将“狗”类表达归纳为“狗喻人”与“狗喻事物”两类结构,揭示动物属性向人类经验领域系统映射的路径机制;张晨鑫(2021)从认知层面论证,民族文化中对动物形象的褒贬取向差异,会在隐喻建构过程中影响源域要素的筛选与凸显方式。胡兰KHULAN.J(2021)对“狗”类俗语的情感色彩进行量化统计,指出褒义表达中汉语占7%、蒙古族语占17%;贬义表达中汉语占57%、蒙古族语占75%;中性表达中汉语占36%、蒙古族语占8%。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多聚焦于象征意义与情感分布的比较,对源域特征在不同社会生态背景下的选择性激活机制,以及其通向目标域的结构性投射路径差异,尚缺乏系统而深入的阐释。

3) 2008年,“蒙古八忌”被正式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内容包括火忌、水忌、病忌、产忌、做客忌、忌蹭门槛、忌摸头、忌打狗等传统禁忌。在蒙古族社会中,入牧户为客时切忌打骂其家犬,否则被视为对主人的严重不敬,违犯此忌往往引发强烈反感甚至冲突。

基于此,本文并不旨在简单比较汉蒙“狗”谚语的褒贬差异,而是尝试回答一个具认知结构意义的问题:在不同社会生态结构与生产方式背景下,同一动物源域为何会生成差异化的目标域投射路径?社会生态结构如何影响源域特征的选择性凸显,并将其组织进不同的社会行为模式与价值评价体系之中?

围绕这一问题,本文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以“源域—目标域”映射机制为理论主线,选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辑(1982)《蒙古族谚语》⁴⁾所收录的109条“狗”类谚语与徐宗才·应俊玲主编(2004)《俗语词典》中收录的124条汉语“狗”类谚语为核心语料。依据“目标域所指向的社会经验类型”这一分类原则,本文对语料进行功能性归类,将其划分为讽刺·揭露类、人情·事理类、警惕·告诫类、品行·修养类、用途·需要类、爱憎·好恶类、胸怀·信心类等七类,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不同文化语境中源域特征的激活方式及其目标域投射路径的结构差异。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认为所有含“狗”的谚语都与农耕或游牧社会结构形成直接对应关系,而是主要关注其中较具代表性的高频认知模式及其目标域投射倾向。

2. 理论框架与分类原则

为了进一步解释“狗”意象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语义差异及其形成机制,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出发,引入“源域—目标域映射”理论框架,对谚语中动物意象的隐喻结构进行分析。

1) 源域—目标域映射机制的认知基础

从理论层面看,概念隐喻研究为跨域映射机制提供了系统性的解释框架。

4) 《蒙古族谚语》(1982)将“狗”类谚语分为讽刺·揭露、人情·事理、警惕·告诫、用途·需要、爱憎·好恶、胸怀·信心以及道德修养、谦虚谨慎、勇敢坚强、勤劳节俭等十类。

Lakoff与Johnson(1980)指出,隐喻并非单纯的语言修辞,而是一种组织认知经验的基本机制。人类往往借助具体、可感的经验域对抽象领域进行结构化理解,这一过程通过“源域-目标域”映射实现:以经验性较强、结构较清晰的认知域(源域)为基础,将其内部结构要素系统投射至另一认知域(目标域),从而完成对后者的概念化建构。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张小平(2008)强调,“相似性”是隐喻生成的重要认知前提;陆俭明(2009)提出“认知域激活假设”,认为跨域映射的形成依赖不同认知域之间的选择性激活机制。这些理论共同表明,隐喻的本质是一种认知结构重组过程,而非简单的修辞替代。

在动物隐喻建构中,“狗”作为具体可感的动物经验域,其体貌特征、行为模式、功能属性与社会角色构成源域内部的结构要素。这些要素并非机械复制至目标域,而是在特定社会语境中被选择性凸显与重组,进而形成稳定的象征结构与价值指向。本文所称“象征结构”,即源域-目标域映射在群体反复使用中固化而成的稳定评价框架与意义指向。因此,动物隐喻并不是简单的“以动物喻人”,而是源域特征在社会认知模型中的结构化激活过程。

基于上述理论前提,本文将“狗”界定为核心源域,重点考察其在农耕与游牧文化语境中被选择性激活的结构要素,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目标域投射路径。

2) 农耕与游牧文化语境的认知结构差异

在源域-目标域映射机制的理论框架下,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社会经验结构会影响源域特征的选择性激活方式。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农耕与游牧文化语境中认知结构的差异。

以汉族社会为主体的农耕社会以土地为核心资源,社会组织呈现相对稳定的定居结构。生产活动依赖土地控制与劳动力组织,因此更容易形成等级分化与制度化秩序。在这一结构中,社会评价往往通过伦理规范与身份关系加以表

达，语言中的动物意象也更容易被纳入道德评价与社会等级的象征体系。

与此不同，以蒙古族社会为典型的游牧社会以牲畜移动与草场利用为基本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呈现出较强的流动性与风险共担特征。生产活动高度依赖人与动物之间的协作关系，因此动物在社会经验与认知建构中具有更直接的功能意义。

因此，不同生产方式所形成的社会生态结构，为动物意象在语言中的不同认知激活路径提供了宏观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狗”在汉语与蒙古族谚语中的象征功能与语义评价取向。

3) 分类原则与分析路径

在理论框架确立之后，有必要进一步说明语料分类的依据与分析路径。不同于既往仅依据情感色彩(褒义/贬义)进行划分的做法，本文以“目标域所指向的社会经验与人格认知类型”为核心认知原则，对语料进行功能性分类。

所谓“目标域社会经验类型”，是指谚语中“狗”意象最终投射的人类经验领域及其所承担的社会功能，如社会批判、经验归纳、风险警示、行为规训、功能价值与情感表达等。换言之，分类标准并非基于字面意义或单一情感倾向，而是依据源域向目标域投射后的结构位置及其在社会认知体系中的功能属性。

在此原则下，语料被划分为如下七类：

- 1) 讽刺·揭露类: 指向社会批判与道德否定
- 2) 人情·事理类: 指向经验归纳与因果逻辑
- 3) 警惕·告诫类: 指向风险意识与行为预警
- 4) 品行·修养类: 指向个体道德规范与行为约束
- 5) 用途·需要类: 指向功能价值与现实需求
- 6) 胸怀·信心类: 指向人格精神与心理结构
- 7) 爱憎·好恶类: 指向情感评价与态度表达

七类分别对应不同层级的社会经验与人格认知结构：从社会批判、经验归纳与行为规训，延伸至功能评估、情感表达与人格认知，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目标域系统。这一分类方式有助于从结构层面考察源域特征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激活方式及其目标域投射路径。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重点比较两种文化语境中源域特征的选择性激活方式、结构组合模式及其目标域投射倾向的差异，进而探讨社会生态背景与隐喻建构之间的对应关系。

3. 跨域映射比较分析

本章在“源域-目标域”映射框架下，对汉语与蒙古族“狗”类谚语进行语义功能分类，并在分类基础上比较两种文化语境中“狗”源域特征的选择性激活方式及其目标域指向差异。七类功能类型分别对应不同的社会经验域，能够较为集中地呈现农耕与游牧社会在价值判断、社会关系与行为规训方面的关注重心。

为便于整体把握七类功能类型在源域-目标域结构中的对应关系，现将其最小映射框架概括如下：

| 功能类型 | 优先激活的源域特征 | 目标域落点(社会功能) |
|-------|----------------|---------------|
| 讽刺·揭露 | 攻击性、依附性、反噬性 | 人格否定 / 权力结构批判 |
| 人情·事理 | 因果偏移、群体互动、处境反应 | 经验归纳 / 社会互动规律 |
| 警惕·告诫 | 隐蔽攻击、失控反应 | 风险提示 / 行为预警 |
| 品行·修养 | 忠诚、守护、习性稳定 | 道德规范 / 行为规训 |
| 用途·需要 | 工具性、功能适配 | 资源评估 / 功能匹配 |
| 胸怀·信心 | 守位、前行、抗扰 | 人格精神 / 信念建构 |
| 爱憎·好恶 | 亲疏反应、立场偏向 | 情感评价 / 价值立场 |

〈表 1〉七类功能类型的最小源域-目标域对应关系

上述框架仅呈现各类型的最小对应关系，具体语料中源域特征的激活顺序与组合方式仍会因文化语境差异而发生变化。下文将在此基础上分别展开具体

比较分析。

1) 讽刺·揭露类

本类谚语以揭露社会失序、权力异化与道德失范为核心功能。在该类型中，“狗”主要以攻击性、依附性与污秽性等特征进入表达系统，并被结构化为负面社会行为的评价模型。在本文所涉语料范围内，“讽刺·揭露类”在两种语言材料中占比最高：汉语46条⁵⁾，蒙古族语52条。数量上的集中表明，“狗”意象在两种语言系统中首先被固化为一种高频社会批判工具，而非单纯的情绪性辱骂标签。

胡兰KHULAN.J(2021)在情感色彩统计中指出，中蒙“狗”类表达整体上均以贬义概念为主。在贬义指向的具体展开上，汉语语料更多聚焦于欺骗行为、品行失范与言语不诚等社会评价维度，其批评重心偏向行为规范与道德判断；蒙古族语材料则更侧重于冲突性格、粗暴举止与冷酷面貌等人格特征的描写，其否定取向多集中于性格气质与互动方式。由此可见，两种语言虽共享“狗-负面评价”的基本认知框架，但在目标域的具体激活路径与评价重心上呈现出结构性的分化。

需要强调的是，本类谚语并非简单“骂狗”，其表达机制通常为：以可观察、可重复的动物行为为原型，抽象出稳定的经验结构，再迁移至人类社会领域，从而完成对人格劣性、依附机制或制度失衡的批评。根据语料分布与表达结构，本类可归纳为三种主要模式：本性难改型、权力依附型与忘恩负义型。

5) 秦乔迁(2016)以《中国惯用语大辞典》所收录的十二生肖惯用语为研究对象，从褒义、中性义与贬义三个维度进行了系统分类。统计显示，“狗”类惯用语共96条，其中贬义87条，褒义6条，中性3条，为十二生肖中贬义比例最高者。相比之下，“马”类虽数量最多(148条)，但贬义72条、褒义26条、中性37条，呈现多向分布；“龙”类则以褒义与中性义为主，几乎不含贬义。该分布结构表明，“狗”在汉语象征体系中呈现出高度集中的负面化倾向。

(1) 本性难改型：行为惯性的道德化

汉语典型语料如“狗改不了吃屎”、“狗走千里，不忘吃屎”；蒙古族典型语料如“狗到哪里也改不了吃屎，官到哪里也改不了受贿”、“装奶之器，奶味不易除；吃皮之狗，恶习难改”。

该类型围绕“行为惯性”展开。某种行为被经验化为“反复出现、难以纠正”的稳定模式，进而上升为人格判断。“吃屎”作为高频源域原型，因其污秽性、可观察性与重复性而易被固化为“天性难移”的经验结构⁶⁾。由此形成“本能—重复—稳定”的链条，并最终转化为否定性人格评价。

其映射结构大致表现为：施事所具有的某种负面行为特征，通过重复行为不断被强化，并进一步投射至人类社会经验领域，对应贪腐、卑劣或积习难改等负面评价。在目标域指向上，汉语语料较多停留于人格与品性的行为批评；相较而言，蒙古族语料中部分表达则通过“狗—官”等并置关系，使相关批评进一步进入权力关系与社会结构语境。

(2) 权力依附型：等级结构的讽刺化

汉语代表语料如“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狗朝屁走，不知道臭”等；蒙古族代表语料如“百姓面前是狮子，长官面前是叭狗”、“官官相护，狗护其崽”、“狗守护浩特⁷⁾，官剥削庶民”等。

该类型的核心在于依附关系与等级结构的揭示。狗作为家养动物，其行动依赖主人权威，由此形成“依附—借势—施压”的经验模式；同时，在依附过程

6) 张艳慈(2013: 15)指出，汉语文化中“狗”意象呈现“忠诚服从/阿谀卑贱”双重结构，但整体语义取向仍偏向贬抑。李树新·王冲(2014: 29 - 30)认为，“狗”虽因贴近日常生活而广泛嵌入语言系统，但其“谄媚、势利”等形象更常被用于讽刺与贬斥。苗雨婷(2020: 34 - 37)进一步指出，在传统社会等级结构下，大量含“狗”的喻人表达用于指涉卑微与卑劣行为。秦乔迁(2016)的统计亦显示，“狗”类惯用语在十二生肖中贬义比例居首。上述研究共同表明，在汉语象征体系中，“狗”的负面语义具有较高稳定性与文化强化效应。

7) 在“狗守护浩特”这句蒙古族谚语中，“浩特”(蒙古语qot / khot)原意为：城镇、聚落、部落定居点或营帐群的集合地，相当于“村寨”或“部落定居点”的意思。

中，个体的判断标准亦随之转移，表现为对负面对象的趋附与认知失察，如“狗朝屁走，不知道臭”。上述机制迁移至社会权力场后，构成“附庸—权威—压制—弱者”的结构链条。

汉语语料表达较多侧重对趋炎附势、欺软怕硬等行为与品性的批评；相较而言，蒙古族语料中部分表达更常将“狗”与“官”并置，使相关隐喻关系在语言层面更加显性化，并进一步进入权力关系与社会结构语境。

(3) 忘恩负义型：道德关系的逆转结构

汉语典型语料如“救了落水狗，回头咬一口”、“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等。

该类型通常以施恩者与受恩者之间的伦理关系为基础，现实行为却出现“施恩—反噬”的逆转，由此形成明显的道德冲突。其认知机制在于通过“反咬”行为强化“背恩”“失义”等负面评价，使相关表达逐渐形成较稳定的失范认知模式。

相较而言，蒙古族语料相关讽刺类表达中，“受恩—反咬”结构相对较少出现，其批评重点更多集中于权力依附、行为劣习或关系失衡等内容。由此可见，汉语语料较多进入伦理关系与行为规范语境，而蒙古族语料则较多呈现社会关系与结构性互动等表达倾向。

(4) 汉蒙对比

总体而言，在讽刺语境中，汉语语料较多激活人格、伦理与行为规范等维度，通过行为失范与道德冲突构建批评框架；相较而言，蒙古族语料则较多呈现权力关系、等级互动与结构性失衡等表达倾向，并通过“狗—官”等并置关系强化相关隐喻联系。

两种语料虽共享“狗—负面评价”的基本映射模式，但在批判对象与目标域指向上仍存在一定差异：前者较多进入人格与伦理评价语境，后者则较多呈现社会关系与结构性互动等内容。这说明，在讽刺语境中，源域特征的选择性激活方式可能与不同社会经验背景存在一定对应关系。

2) 人情·事理类

在人情·事理类中，汉语语料共24条，蒙古族语料共20条。本类谚语借助“狗”的行为与处境反应，总结社会互动中的常见规律与处世经验。此时，“狗”不再作为贬抑对象，而成为经验归纳的参照原型。

本类谚语的共同特征在于以动物行为的可观察性为基础，将复杂的人际关系、因果判断与群体互动转化为可重复的行为模型，从而概括社会常态。

(1) 责任转嫁型：因果错置的呈现

汉语语料如“白狗偷吃，黑狗遭殃”、“黄狗吃了米，逮住黑狗剃尾”等，呈现“行为者—受罚者”不一致的结构，揭示责任错置与替罪现象；“狗咬挎篮的，贼抢有钱的”则强调行为对象与利益之间的对应关系。其核心在于因果链条发生偏移，结果与责任不相匹配。

蒙古族语料虽少见直接的“替罪”结构，但如“胜利者的马犹如狮，失败者的骥宛如狗”，体现评价随结果转移的逻辑，说明社会判断往往受成败导向支配。两类语料均通过动物类比揭示因果判断中的偏向机制。

(2) 群体行为型：互动模式的重复性

汉语语料如“一犬吠影，群犬吠声”体现从众心理；“狗咬狗，两嘴毛”强调冲突双方的相互损耗；“狗有狗道理，鬼有鬼道理”则体现不同立场之间的认知差异。此类表达多围绕人际互动与关系冲突展开，反映群体行为中的心理趋同与立场对立现象。

蒙古族语料中，“无狗之处，猪来狂吠”呈现权威缺位下的秩序变化；“邻居的狗向外叫，自家的狗朝里吠”体现亲疏立场差异；“好叫的狗不厉害，无声的狗好咬人”揭示表象与实际之间的反差。不同语料虽侧重点不同，但均通过狗的行为归纳群体互动的稳定模式。

(3) 角色对应型：身份与行为的匹配

汉语语料如“人有人房，狗有狗窝”强调身份界限；“抓狗儿子看狗母”体现来源影响评价；“叫花子打狗靠面墙”说明弱者行事需借助条件。其共同点在于强调角色、身份与行为之间的对应关系。

蒙古族语料如“家狗效法主人，帽子模仿脑袋”表现角色模仿机制；“被割耳的狗，对主人亲近”揭示弱势依附心理；“诺彦⁸⁾死了没有管狗的”强调职责与位置之间的对应。两种语料均突出社会结构中的位置逻辑与角色稳定性。

(4) 处境反应型：环境与行为的联动

汉语语料如“对恶狗用棍子，对强盗用刀子”强调应根据对象差异采取不同应对方式；“当家三年狗也嫌”反映长期相处可能导致关系厌倦；“狗咬人有药医，人咬人没药医”则通过对比突出人际伤害较身体伤害更难修复。此类表达多围绕情境差异与行为应对展开，体现经验判断与处世认知。

蒙古族语料如“狗急了跳墙，人急了越轨”指出极端处境导致越界；“墙高家狗凶”“春雪消融，猎狗难追”强调环境变量对结果的影响；“狗崽放高处，它要往下跳”呈现本能与处境之间的对应关系。此类表达更明显地凸显环境条件对行为走向的作用。

(5) 汉蒙对比

在经验归纳语境中，汉语语料相对侧重激活“关系判断—行为选择”维度，通过因果错置、从众心理与身份匹配等模式概括人际互动逻辑；蒙古族语料侧重激活“处境结构—环境变量”维度，通过成败导向、权威缺位与环境变化等因素解释行为结果。

两种语料虽均借助狗的行为归纳社会常态，但在经验模型的组织方式上存

8) “诺彦”(蒙古语：noyan / noyon)是一个典型的蒙古贵族称谓词，其核心含义与社会等级密切相关。

在差异：前者更关注关系处理与行动策略，后者更强调结构条件与处境影响。

3) 警惕·告诫类

在本类中，汉语语料共22条，蒙古族语料共15条。“警惕·告诫类”谚语并不以揭露或批判为主要目的，而是通过狗的行为形态建构风险意识。在这一语义范围内，“狗”主要作为危险征兆的参照对象，其行为被反复用来提示潜在威胁与应对方式。

相关语料多围绕“咬”、“吠”、“急”、“疯”、“跳”等动作展开，将抽象风险转化为可感知的动物行为，使危险在经验层面具象化，从而强化群体对风险的识别能力与防范意识。此类表达的认知核心在于，通过“可见行为”映射“不可见风险”，实现对潜在威胁的提前感知与规避。

(1) 隐蔽危险型：表面平静与潜伏攻击

汉语语料如“不出声的狗才咬人”、“不叫的狗咬人”、“恶狗咬人不露牙”、“猛犬不吠，吠犬不猛”、“叫狗不咬，咬狗不叫”等，强调“沉默”与“攻击”之间的关联。蒙古族语料如“咬人的狗不呲牙”、“恶狼容易对付，贼狗不好提防”，同样突出隐蔽性。

此类表达呈现出一个稳定经验模型：真正的危险往往潜伏于表面平静之下。“不吠”“不露牙”等特征成为危险尚未显现时的前兆信号。通过“叫”与“咬”的对照结构，谚语提示个体不应仅凭外在声势判断安全与否，而需警惕沉默状态中的潜在威胁。

在表达方式上，汉语语料较多借助对比句式强化风险识别逻辑；相较而言，蒙古族语料则更倾向于直接呈现“难以提防”的行为结果，但二者均将“隐蔽性”视为危险的重要认知特征。

(2) 极端反应型：被逼情境与失控行为

汉语语料如“狗急跳墙”、“犬急跳墙，人急做贼”、“人逼造反，狗逼跳墙”、“疯狗临死还要蹬三脚”等，描写高压情境下的极端反应；蒙古族语料如“开了锁链的狗儿厉害，逃出监狱的囚犯厉害”，强调约束解除后的风险放大。

此类表达多围绕“压力累积—行为失控”之间的关系展开。“狗急跳墙”已逐渐固化为极端处境下行为反弹的典型表达，用以说明压迫与反抗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锁链解开”与“囚犯逃出”的并列，则强调约束机制失效后风险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

两类语料均表明，风险不仅来源于攻击行为本身，也与情境失衡及控制失效所带来的不确定后果有关。

(3) 防患未然型：信号识别与提前应对

汉语语料如“不能怕疯狗而不出门”、“未厠屎先唤狗”、“拎棒子叫狗，远去了”“叫打狗别骂街”等，强调风险识别与行为分寸。蒙古族语料如“听见狗咬声，应举起鞭；听见狼嗥声，应拿起枪”、“离烈狗牙近易咬伤”等，则强调信号出现后的及时反应。

在这一类型中，狗的吠叫、牙齿与疯态等行为特征常被视为潜在危险的前兆信号。汉语语料较多强调防范意识与日常行为之间的协调关系，避免因过度反应或处理失当而引发新的风险；相较而言，蒙古族语料则更突出“信号—行动”之间的对应关系，强调在具体情境中及时作出反应。

(4) 后果预警型：行为失误与结果警示

此类谚语以“结果呈现”为主要表达方式，通过对负面后果的强化凸显，对行为偏差形成反向规训。与前几类侧重风险识别或情境预判不同，该类型不依赖显性危险信号，而是通过“行为失误—不良结果”的因果链条，将潜在风险具体化，从而增强对行为选择的约束力。

汉语语料如“狗咬一口，入骨三分”、“嗷疯狗咬傻子”等，多以伤害后果或错误行为的结果呈现为核心，突出行为失当所带来的持续性与不可逆影响。蒙古族语料如“喂大的狗反咬坏手”、“养只哈巴狗村子不安宁”、“姑息养奸，莫如养条好狗”等，则强调纵容与失控之间的内在关联，将风险来源由外部威胁转向内部积累；又如“老虎虽有力，叭儿狗多了就被捉；将军虽有勇，骄傲轻敌就失败”，通过“优势-轻敌-失败”的结构，揭示认知偏差向现实风险转化的过程。

该类型的认知重点并不完全在于危险本身，而是更关注主体判断失误可能引发的结果。其表达机制主要通过结果反推行为选择，使风险意识逐渐转化为“避免失败”或“减少损失”的行动导向。

总体而言，“后果预警型”多以结果作为认知锚点，并通过因果关系强化行为规范意识，从而形成由结果反向影响行为判断的认知模式。

(5) 汉蒙对比

在风险建构语境中，汉语语料相对更侧重“风险识别-行为判断”维度，通过沉默与攻击之间的对照强化警觉意识与行为分寸；相较而言，蒙古族语料则较多呈现“环境应对-行动反应”维度，通过具体信号与行为方式之间的对应关系强调处境中的即时反应与秩序维护。

两种语料虽共享“攻击性-不可预期性”的基本源域结构，但在风险经验的组织方式上仍存在一定差异：前者较多突出识别与判断，后者则较多强调应对与行动。

4) 品行·修养类

在本类中，汉语语料共20条，蒙古族语料共4条。在“品行·修养类”中，狗成为道德判断与行为规范的映射载体。本类谚语围绕忠诚、知恩、伦理秩序、谨慎节制与勤劳自立等品行展开，通过对狗行为的类比，使抽象的伦理观念转化

为具体可感的行为形象。狗的形象在此被纳入规范性话语结构之中，成为界定行为标准与评价品行的重要参照。

这类谚语的显著特征在于，其表达目标指向“应当如何”，强调行为规范与价值取向，而非单纯描述社会现象。

(1) 忠诚·护主类

汉语语料包括：“恶狗不离主”、“狗知主人意”、“狗还向主人三分”、“打狗看主人”、“打狗欺主”、“打狗伤主人”、“恶犬护三村”等。

此类表达围绕主从关系展开，将狗与主人之间的依附结构嵌入社会评价体系。“打狗看主人”等说法强化个体行为与其所属身份之间的关联，使角色位置与责任承担形成稳定对应。狗在此成为守护与依附的象征，其行为被纳入忠诚与责任的伦理框架之中。

蒙古族语料如“与其养坏人，不如养好狗”，通过对照结构将“好狗”置于可靠一侧，明确肯定忠诚与可依赖品质。

从认知机制上看，该类型多围绕“依附关系—责任延伸—行为评价”展开，通过主从关系与行为反馈之间的联系，对忠诚与责任意识进行表达。

(2) 知恩·伦理评价类

汉语语料包括：“救了落水狗，回头咬一口”、“属狗的，记吃不记打”、“良心叫狗吃了”、“心肝被狗吃了”等。

此类表达围绕忘恩与失德展开。通过“反咬”、“吃良心”等具体动作，将“忘恩负义”、“良知丧失”等抽象概念具象化，使道德评价转化为可感知的行为场景。狗在此成为背恩与失德的象征，用以界定伦理底线。

蒙古族语料在该主题上分布较少，未形成与“反咬”结构相对应的稳定表达模式。

从认知机制上看，该类型多围绕“行为反转—伦理违背—负面评价”展开，通过具体行为场景强化对“忘恩”“失德”等行为的道德否定。

(3) 行为规训类

汉语语料如“笼牢犬不入”、“人暖腿，狗暖嘴”、“什么主人养什么狗”、“人熟狗不咬”等，多通过具体生活情境呈现行为方式、生活选择与生存状态之间的对应关系，强调习性养成、环境影响及处世方式对结果的制约作用。

蒙古族语料如“人懒无饭吃，狗懒无屎吃”，将行为品质与生存结果直接并置，构建“行为—结果”的因果模型，突出勤劳与自立的重要性；“人有礼貌好，狗有尾巴好”则通过类比结构确立行为规范的应然标准。

从认知机制上看，该类型多围绕“习性—行为—结果”之间的关系展开，通过日常经验中的行为反馈强化对勤劳、自律与处世规范的认知。

(4) 汉蒙对比

综合来看，在品行规训语境中，汉语语料较多通过关系结构与身份角色建构行为规范，将狗的依附关系与伦理评价纳入既有社会关系框架之中；相较而言，蒙古族语料则更侧重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对应关系，使品行判断与现实后果形成较直接的联系。

上述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社会经验背景下源域特征的选择性激活倾向：汉语语料较多呈现“关系型”表达模式，而蒙古族语料则较多呈现“结果型”表达模式。

5) 用途·需要类

汉语语料共7条，蒙古族语料共10条。在“用途·需要类”中，狗不再承担道德评价或风险象征功能，而被纳入功能性与工具性的认知框架。本类谚语围绕“是否有用”“是否值得”“是否匹配”展开，将狗置于生产结构与资源流通体系之中进行评估。其价值并非固有，而取决于具体情境与实际需求。本类表达关注资源配置与功能实现，使价值判断转化为可感的生活经验。

(1) 资源消耗型

汉语典型语料包括：“帮狗吃食”、“瓠瓜打狗失一半”、“拿肉包子打狗”、“肉包子打狗”、“一个馒头能叫狗打滚，一块洋钱能叫鬼推磨”等。

该类表达围绕资源投入与损耗展开，强调投入对象与回收结果之间的对应关系：资源一旦进入特定对象，往往难以回流，从而形成“投入—损耗”的单向结构。在此过程中，“狗”更多被视为资源难以回收的对象，其形象主要服务于投入风险与得失判断的表达。

从认知机制上看，此类谚语多围绕“投入—回收—损耗”之间的关系展开，通过成本与结果之间的对比强化对得失关系的经验判断。

相较之下，蒙古族语料中较少出现此类“不可回收”结构，其认知取向更多指向功能实现而非损耗计算。

(2) 功能优先型

本类型主要见于蒙古族语料，如：“稀有的马，是牧人之宝；罕见的狗，是猎人之宝”、“打死兔子，扔掉猎狗”、“打猎的人，猎狗宝贵；打鱼的人，鱼网宝贵”、“棍棒能吓住恶狗，猎枪能吓住豺狼”、“没狗的地方猪看家”等。

该类表达多围绕“狗”在具体生产与生活情境中的实际作用展开，其价值往往取决于特定任务中的功能实现：一方面体现工具与任务之间的对应关系，另一方面表现功能缺位时的替代机制，强调实用性优先于象征性评价。

从认知机制上看，此类谚语多围绕“功能—任务—价值”之间的关系展开，将个体评价与实际效用联系起来，强调功能实现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对应关系。

相较之下，汉语语料中此类表达分布较为有限，较少将“狗”直接纳入生产结构进行功能性评价。

(3) 情境转化型

此类型主要见于蒙古族语料，如“如果水漫鼻子，狗也变成水牛”“人不来，

狗不叫”等；汉语语料中相关表达相对较少。

该类表达多以情境变化为前提，强调环境条件对行为与功能的影响：极端处境可能改变原有功能分工，而具体场域则会影响行为方式与作用范围。

在此类语料中，“狗”更多作为随情境变化而发生功能调整的对象，其意义往往与环境条件及现实需求相关。

从认知机制上看，该类型主要围绕“情境—行为—功能”之间的关系展开，体现出对环境适配与现实条件的关注。

(4) 匹配原则型

蒙古族语料如“人，丢了脸如狗；狗，没了尾象猴”“狮子的脾气，叭狗不配；凤凰的猎技，不适于喜鹊”等，主要体现能力、身份与适用范围之间的对应关系；相较而言，汉语语料中此类表达相对较少，相关认知模式未形成高频表达结构。

该类表达强调，个体行为与其能力条件、现实处境之间需要保持一定适配关系：特征缺失可能影响原有作用，而能力与位置之间的不匹配则容易产生不协调状态。

从认知机制上看，此类谚语多通过“能力—位置—行为”之间的对应关系强化适配意识与经验判断。

(5) 汉蒙对比

综合来看，在功能评估语境中，汉语语料相对更侧重资源投入、得失关系与风险判断等维度，通过“投入—损耗”结构对行为结果进行评价；相较而言，蒙古族语料则较多围绕功能匹配、任务分工与现实需求展开，将“狗”与具体生产情境联系起来进行功能性评估。

上述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社会经验背景下源域特征的选择性激活倾向：汉语语料较多呈现资源得失相关表达，而蒙古族语料则较多呈现功能适配与生产实践相关表达。

6) 胸怀·信心类

汉语语料共5条，蒙古族语料共4条。在“胸怀·信心类”中，狗成为稳重、自持与担当精神的映射载体。本类谚语围绕“守”、“行”、“不乱”、“照样”等行为特征展开，通过动物行动图式建构一种在干扰、压力与困境面前保持定力与信念的价值观。其表达重点不在外部评价，而在主体品格与行动姿态的塑造。

(1) 汉语语料：守成与自持

汉语语料包括：“好狗不出门”、“好狗不挡道”、“好狗护家门”、“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邻”、“好犬不乱吠”等。

此类表达围绕“好狗”这一评价结构展开，“好”作为价值标记，使狗被塑造为稳重、自持与守责的象征。在具体表现上，一方面通过“守护”行为强化责任担当与位置意识，另一方面以否定性行为描写凸显节制原则，呈现“不越位、不张扬”的行为规范。

整体而言，汉语语料多以“守”为核心行为模式，通过守护、克制与不越位等行为表达，对稳重、自持与责任意识进行积极评价。

(2) 蒙古族语料：前行与坚定

蒙古族语料包括：“任凭狗狂吠，骆驼照样行”、“别人的诽谤，不至置人死地；猎狗的舔舐，不至使海变脏”、“车到山前必有路，狗落水中会游泳”、“能捉老虎的猎狗，也是从小崽子长大的；能治国家的英雄，也是从娘胎里生出的”等。

该类表达多围绕“行动持续”展开，通过对比与类比结构，将外在干扰与主体行动区分开来，并借助经验性判断减弱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影响，从而强调坚持行动与长期积累的重要性。同时，相关表达也将能力视为长期成长与实践积累的结果，使“过程”与“结果”之间形成较稳定的对应关系。

从认知机制上看，此类谚语主要围绕“行动—积累—结果”之间的关系展开，通过持续行动与经验积累强化对能力形成与结果实现的理解。

整体而言，蒙古族语料较多呈现“持续行动”相关表达，强调在干扰与不确定情境下保持行动与积累的重要性。

(3) 汉蒙对比

在主体精神表达语境中，汉语语料相对更侧重“守护—克制”相关行为模式，通过守责、不越位与节制等表达，对稳重、自持与责任意识进行积极评价；相较而言，蒙古族语料则较多呈现“前行—坚持”相关表达，通过行动持续与长期积累强调面对干扰时的坚持与韧性。

两种语料虽共享“狗—行为原型”的基本映射路径，但在相关行为模式的组织方式上仍存在一定差异：前者较多强调稳定、责任与行为分寸，后者则较多强调行动持续与环境应对。

7) 爱憎·好恶类

汉语语料共2条，蒙古族语料共3条。在“爱憎·好恶类”中，狗成为情感态度与价值立场的映射载体。本类谚语围绕“爱”、“嫌”、“恨”、“嫉”等情绪反应展开，通过对情感偏向的描写呈现社会中的偏爱与排斥、亲近与仇怨，揭示情感分配机制与价值判断方式。其表达重心在于情感立场的确立，而非风险提示或功能评估。

(1) 汉语语料：情感偏向的揭示

汉语语料包括“人爱福的，狗咬穷的”“人嫌狗不待见”等。

该类表达多通过情感取向的差异化分布，呈现社会关系中的亲疏偏向：一方面借助对照结构揭示趋利避害的行为倾向，使弱者更容易处于被忽视或受损

的位置；另一方面通过递进关系强化排斥意味，使负面评价在关系互动中不断累积。

从认知机制上看，该类型主要围绕“情感取向—评价结果—关系互动”展开，通过好恶判断强化社会关系中的亲疏差异与评价倾向。

整体而言，汉语语料较多通过情感偏向表达社会关系中的不平衡状态，“狗”多被置于被贬抑或被排斥的一侧。

(2) 蒙古族语料：立场边界的确立

蒙古族语料包括：“狗是人的良友，官是人的仇人”、“对骑牛的人，狗嫉恨；对说实话的人，人记仇”、删除这部分“对于手拿拐杖的人，狗也要仇恨；对于口直嘴快的人，敌人要仇恨”等。

该类表达多采用对照结构，通过并置不同对象与情感指向，强调认同与排斥之间的界线：一方面通过对比强化价值排序，另一方面借助类比结构将动物反应与人类情感联系起来，从而突出不同立场之间的情感差异。

从认知机制上看，此类谚语主要围绕“对象—情感—立场”之间的关系展开，通过情感判断强化认同与排斥之间的边界意识。

整体而言，蒙古族语料较多通过对照结构表达情感立场，“狗”在相关表达中更多承担正面参照或比较对象的作用。

(3) 汉蒙对比

在情感立场表达语境中，汉语语料相对更侧重“失衡—反讽”相关表达，通过揭示趋附与排斥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反映社会情感偏向；相较而言，蒙古族语料则较多呈现“对照—界定”相关结构，通过明确的价值排序强化认同与排斥之间的边界。

两类语料虽均围绕情感偏向展开，但在源域特征的激活方式上仍存在一定差异：前者较多通过揭示关系失衡强化反讽意味，后者则较多借助对照结构突出情感立场与价值界线。

4. 结论

本文在认知语言学“源域-目标域”映射框架下，以汉语与蒙古族语“狗”类谚语为对象，从目标域社会经验与人格认知出发，将语料划分为七类，并比较两种文化语境中源域特征的选择性激活方式及其认知功能差异。

研究表明，“狗”这一动物源域在两种语言中并不对应单一象征意义，而是在不同语境中承担多种认知功能。七类类型分别涉及社会批判、经验归纳、风险识别、规范建构、功能评估、人格表达与情感立场等不同经验领域，体现出动物隐喻在不同社会经验中的选择性激活与功能性重组过程。

在跨语言比较层面，汉语与蒙古族语料虽共享“狗-行为原型”的基本映射基础，但在源域特征的激活方式与目标域指向上仍呈现出较明显的差异倾向。汉语语料相对更侧重关系评价、伦理秩序与行为规范等内容，较多围绕人格评价、资源得失与行为规训展开；相较而言，蒙古族语料则较多呈现功能实现、环境应对与行动过程等表达倾向，强调功能匹配、情境适配与持续行动。

从整体趋势来看，两类语料在目标域组织方式上存在一定差异：汉语语料较多通过关系结构与行为评价展开表达，而蒙古族语料则较多通过功能关系与现实处境组织经验。这说明，源域特征的选择性激活方式可能与不同社会经验背景存在一定对应关系。

综上，汉蒙“狗”类谚语的比较不仅揭示了动物隐喻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多功能性与差异化表达，也为理解语言、认知与社会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未来研究仍可结合更多动物意象与跨语言材料，对相关隐喻系统的认知类型与表达机制进行进一步拓展与验证。

參考文獻

- 包苏日娜·李慧贤,《概念隐喻视角下的蒙汉动物谚语对比分析》,《语文学刊》,第43卷第6期,2023。
- 格日乐玛,《蒙汉谚语比较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 韩琦,《中日谚语中与“狗”相关的隐喻表达的认知比较》,《安顺学院学报》,第25卷第1期,2023。
- 胡兰 KHULAN.J,《以鼠、牛、狗作为语素的中蒙动物词汇比较研究》,燕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
- 李树新·王冲,《生肖动物熟语文化意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 陆俭明,《隐喻、转喻散议》,《外国语》,第32卷第1期,2009。
- 罗布桑却丹原著,赵景译,《蒙古风俗鉴》,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 苗雨婷,《现代汉语动物喻人惯用语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辑,《蒙古族谚语》,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
- 秦乔迁,《汉语十二生肖惯用语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 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著,何文忠译,《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浙江大学出版社,1980[2015]。
- 斯琴巴特尔,《蒙古族狗文化浅谈》,《青海民族研究(季刊)》,1998。
- 束定芳,《认知语义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 徐宗才·应俊玲主编,《俗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修订版。
- 姚晨旸,《“X狗”类网络流行语的社会语言学解读》,《文教资料》,第21期(总第903期),2021。
- 张晨鑫,《蒙古族涉动物俗语的文化特性研究》,《汉字与历史文化》,2021。
- 张艳慈,《韩·中国俗谈比较研究——“개”与“닭”的俗谈表现为中心》,江原大学国文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 张小平,《当代汉语词汇发展变化研究》,齐鲁书社,2008。

Abstract

A Comparative Study of Dog-Related Proverbs in Agrarian and Nomadic Cultural Contex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urce-Target Mapping

Hwang, Hoonam · Wu Zhengxuan

Based on the source-target mapping framework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study examines dog-related proverbs in Chinese and Mongolian, aiming to classify their semantic functions and conduct a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The data are categorized into seven types, revealing that the animal domain “dog” performs multiple cognitive functions across different context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se seven types correspond to distinct cognitive mechanisms, including social criticism, experiential generalization, risk awareness, normative construction, functional evaluation, personality construction, and emotional allocation. This suggests that animal metaphor is a process of functional reorganization of source-domain features within different experiential frameworks. In the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Chinese tends to emphasize relational structure, ethical order, and behavioral regulation, whereas Mongolian highlights functional realization, situational adaptation, and action-oriented processes. This difference reflects the divergence in cognitive patterns shaped by agrarian and nomadic socio-ecological systems.

On this basis, the study proposes a socio-cognitive functional model of animal metaphor, offering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language, cogni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Key words : Animal metaphor; Source-target mapping; Cognitive functions; Proverbs; Chinese-Mongolian comparison; Socio-cognitive model

투 고 일 : 2026. 4. 10. / 심 사 일 : 2026. 4. 15. ~ 2026. 5.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6. 5. 20.

